

国家创新发展视域中的新文化景观

张殿元, 张殿宫

摘要: 新媒体、新技术改变了当今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方式, 出现了技术和文化领域的混杂和共同变革, 对“信息”的拼贴、戏仿、解构和重组突破了“科技”与“文化”的边界, 文化表达的平民化也带来了文化价值的重估。这种新的文化景观主要体现在: 国家发展从经济逻辑向文化逻辑的过渡中; 传统文化从继承发展到激活变革的升级中; 国际文化从利益博弈到人文关怀的转换中; 文化模式从封闭拒斥到创新改造的变化中。这种蔑视传统边界和等级、反权威、非逐利的新文化景观, 必将引向以尊重多元、共享和混杂为基础的新文化心态, 形成强调分享、尊重生态、关心人权的新公民文化。

关键词: 国家创新发展; 新文化景观; 传统文化; 国际文化; 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2-0117-05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2.013

建国 66 年来, 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贫富分化、阶层对立、信仰缺失等现代病也随之而来。当代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更强调公平、正义, 更讲求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的特色发展之路, 这需要与过去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模式果断告别。为此, 必须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相呼应, 这种时代精神能够体现中国发展特色, 有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当今社会创新的动力在于情怀、兴趣和信息分享, 而非物质刺激、垄断和集中化管理。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公共教育, 培养创新阶层, 培育创新社会, 倡导独立精神、网络互助和社群意识。蔑视传统边界和等级、反权威、非逐利的新文化景观, 必将引向以尊重多元、共享和混杂为基础的新文化心态, 形成强调分享、尊重生态、关心人权的新公民文化。

一、国家发展的动力转型: 从经济逻辑向文化逻辑过渡中的新文化景观

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于经济建设来说, 法、契约和权利的确立是重要的制度保障, 而这些都离不开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制度因素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人文资源对正式制度的滋养、涵化、拓展和支持, 才形成了能被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标准, 正如斯密所说, 道德情操与市场秩序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上下对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精神的落实, 才有了民间经济活力的释放。而当社会缺少“道德共同体意识”时, 人们的交往行为失范, 信任关系瓦解, 经济就会畸形发展, 从而危机四伏。因此, 福山告诫我们: 一国、一地区的文化和传统将决定他们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命运。

当代中国, 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曾经产生过激发民族主义的强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11&ZD027);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整合还是分化: 转型期中国广告社会建构功能研究”(13ZS001);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广告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12PJC093)

作者简介: 张殿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张殿宫,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但这种单纯把经济增长奉为国家发展重要信条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而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遍布整个社会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这些问题的破解要从文化入手,探寻和挖掘经济发展中的价值理性、节俭经营、创新进取、奋发有为的企业家精神,重整社会风气、抑制腐化堕落,防止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蔓延和泛滥,倡导并确立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文化。可见,由政治逻辑到经济逻辑再到文化逻辑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传媒是当代文化的重要承载和主要表征,作为国家发展理论的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大众传媒的理解是,媒介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控制,在经济建设、民生工程、意识形态培育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作用。传统媒介的自身传播特性和政治属性有利于协调控制,能够很好地嵌入到国家发展理论的框架中。而对于社会属性和传播规律完全不同的新媒体文化来说,置于“转型与混合社会”中考量更合适。在动态发展的当代中国,新媒体构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崭新的文化景观。新媒体、新技术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方式,网络的开放性和数字技术的开源性,让原本局限在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文化产品生产的“PGC”开始向大众开放,用户生产内容的“UGC”越来越普遍,出现了技术和文化领域的混杂和共同变革,对“信息”的拼贴、戏仿、解构和重组突破了“科技”与“文化”的边界,文化表达的平民化也带来了文化价值的重估。同时,与新媒体、新技术相伴而生的知识经济、网络化、灵活积累的概念,也让之前基于规模、理性、大公司、大品牌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小型、自发、非正式成了新经济的标志。

二、传统文化的重获新生:从继承发展到激活变革升级中的新文化景观

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中华民族迈向新征程之时,都会激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因为我们无法隔断过去,自由地选择未来。理解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回到不同的语境下,在西方人的眼中,儒学讲究经世致用,关照现实,缺少理性思辨;而在孔孟的年代包括后来的清朝初年,儒学又被认为是道德理想主义、是虚妄清谈,不具有实际的社会功用。其实,儒学还是那个儒学,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是不同时代的需求。在当今时代,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儒家文化?该如何激活、变革、丰富儒家传统文化,让其中隐含的适应中国发展的现代文化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阐释工程,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当代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不是革命的、断裂的,而是承继的、连贯的,就像牛顿当初是为了寻找上帝创造宇宙的规则,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近现代以来,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的传统文化形塑了中国今天的新文化。

新文化必将也需要在和传统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创新文化模式,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建立在技术和科学基础上的新文化,更多地张扬了现代工具理性,需要儒学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弥补其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足。首先,在网络时代,借助于各种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平台,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便利。大数据技术和算法分析手段,让我们可以从态度到行为、从认知到情感,全面地了解和剖析每个人,并使传播者的信息精准地触达目标人群。但强调互动、追求平权的互联网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类之间的沟通问题,“人们读懂了数据,却读不懂彼此”^[1],强调效率和功利的互联网行为丢掉了人际交往的相处之道,主张“己立立人,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要去“爱人”,这种儒家“仁”的思想可以赋予这种网络人际传播以灵魂,能实现真正的理性沟通;其次,新文化回归自我,崇尚自由,技术赋予大众意见表达方便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的随意性,各种色情、暴力信息充斥于新媒体的各个传播渠道,这除了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之外,道德自律显得非常重要。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主张绝对真理不同,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的学习品格和“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其独也”的自省精神,这些传统文化对网民理性表达起到了很好的规训作用;最后,高扬感性,尊重个性是新文化的人格逻辑,特别是当下中国网民整体呈现出“年龄

低、学历低、收入低”的“三低”特征,年轻网民秉承解构立场,吐槽、戏仿、逗逼、屌丝构成的青年亚文化,将群体、理性、规范和道德踩在脚下,感觉和欲望的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着世界。儒家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礼”,古人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礼数,让人体会生命的庄严。与节气相关的民俗礼仪让人感受自然的神圣,触摸生命在自然中的律动。在消费主义将所有节庆礼仪都化为购物狂欢、视觉盛宴的当下,倡导恢复“敬天法祖”、“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传统,能够让网民对他人敬重,对天地万物充满敬畏感。

另一方面,在新文化呼唤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补强新文化的同时,新文化也在选择性地激活一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观念、思想和行为。首先,学校教育是当今中国最受民间诟病的一种制度安排,以中考、高考为指挥棒,用僵死的知识点绑架学生,造成“一辈子都用不到的东西却决定了我们的一辈子”的尴尬现实。大学以求取功名为目的,把学生当产品、以“适销对路”为原则,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校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儒家文化讲求书院教育,回归教育本质,以人格完善、立身行事、修为境界为依归,通过个人的学习,塑造一个人文礼乐的社会。在短时间尚不能彻底改变现行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民间的书院教育可以一定程度地予以纠偏。而新文化的个性化满足、定制化供给以及线上线下贯通的特点,以在线教育和实体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将儒家书院文化发扬光大;另外,目前中国正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释放被压抑已久的民间力量,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扶持中小企业,激活民营资本。同时,权力结构下沉,多级管理并行,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凸显。力求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个治理杠杆作用,双轮驱动,加快中国社会转型。多年来,政府权力过大,统摄一切,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的负资产,遭受多方质疑。其实,中国古代,政府的管辖单位最低只到县一级,范围更广的区域的治理往往靠宗族、行会自行管理和运行,在家庭和乡党、社区之间推行孝亲和养老,提倡孝道,在国家治理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调动民间力量,实行社会自治,关键在于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钢筋水泥的工业社会里,科层制管理、细密化分工、原子化存在,让现代人变得异常孤单和冷漠。互联网和新媒体、新技术再一次将中国整体带入到一个熟人社会中,网络社区、线上群组、兴趣圈子、互助众筹,通过在线协商讨论,线下组织活动,互联网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激活了一个个小的自治单位,一改中国长时期铁板一块的社会形态。在广大的城市乡村,正在积极探索借助互联网平台实施网格化管理,以养老孝亲等公共服务为抓手,构建新型的社区文化。自我管理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成本,减轻了全能政府的压力。同时,网络公共空间的搭建也为实际的管理积累大量的数据,对于了解社会心态、提升政治认同,加强舆情监控、完善风险管理,吸纳多元民意、参与公共决策,为协同共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借助新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运用传统文化的时候,需要对传统文化做建设性的评价、需要萃取传统文化精华并与现代人所需相适应,需要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高远的精神和博大的智慧,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变通;二是警惕由于缺乏对开放哲学观念的真正接受、缺乏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刻认识、缺乏对现代化本身的充分了解,新媒体、新技术可能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造成垄断和集权^{[2](P295)}。

三、国际文化的形塑重建:从利益博弈到人文关怀转换中的新文化景观

按照多伦多学派的观点,在当今媒介化的时代,要想了解一种文化,一定要密切关注传播媒介,因为在人类的文化结构和人类心智中,传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相比传统媒体,新媒体在更深的程度上延伸着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身体,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扩展着我们的心理。新媒体因为互联网传播的远程交互、自由开放、全球同步和全民参与的信息处理特性,消解着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个体之间的边界,从而为人们获取与传递信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渠道,也为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沟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的升级换代加快,人们越来越依赖新媒体发布信息、传播

思想,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复杂的连接系统,当这个动态的互联系统达到复杂性的某一临界点时,一种超越任何个人能力的集体心智就将产生,个人智慧将构成并受益于这个集体心智。在新文化的引领下,一种也许我们知道但从未被真正践行过的国际文化将变成现实。

建立在新技术构成的集体大脑之上的国际文化,肇始于并最终指向政治全球化。以往的国际文化所营造的是一个打上更多局部利益的、表面多元内里单纯的一致化世界,实力外交、霸权主义、西方中心、大国博弈这些国际政治生态实质性地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旧有的国际文化体系并没有让世人真正感受到大同世界的存在,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消费主义狂欢像夜空中绚烂的烟花,遮蔽了更大范围的黑暗,卫星电视和世界通讯社展现的,要么是全民幸福的娱乐盛宴,要么是看起来和自己无关的世界苦难,支撑现实世界运行的权力之手被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起来了。新文化正在塑造的世界是一个揭开了面纱的、呈现复杂面向的、需要不断调节和重新规划的真实存在,它不完美,但正因为不完美才激起了人们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想法。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虚假繁荣,非但没有让世界找到团结的感觉,反而造成了世界动荡、阶级斗争、贫富分化,他要让 Facebook 成为政治、经济之外全球一体化的手段。

我们不知道这些来自民间,服务大众的互联网巨人是否会成为予取予夺的新权力中心,但我们知道这种新文化事实上消解了已有的权力核心,这些权力体的统治逻辑与互联网规则的天然违和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基于平权和赋能基础上的新国际文化将启动民主程序的人类未来,在避免技术全能主义的同时,让新文化充分肯定并尊重远比它本身更博大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共享文化资源、互动接触、有效参与、对等责任、相互调整。这些互联网的交往原则,可以让独立的个体和文化共同体和谐共存,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把习惯性的否定成分转化过来。“当共同的经验朝一个不同的方向移动时,失败——‘局外人’那种洋洋自得的不妥协——将会失去它现在的魅力。再也没有人会以离群索居、以否定、或者以漫不经心地认可个人的失败而感到自豪。”^{[3](P412)}

新技术的发展已然到了临界状态,它对世界改造的力量将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技术已经开始对产生它的文化开战了。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累积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字时代完成的,世界文化也多半是用笔和文字书写的,而当下强大的网络即时通讯技术将我们从过去占支配地位的识字文化拉回到口语文化,“在即将到来的口语——控制论的信息文化中,无知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因为‘不循规蹈矩’的人比‘循规蹈矩’的人将在功能上占优势。无知者将具有灵活性,因为他们不必向旧的偏见和思想倾向开战,从而更便于学习新技术”^{[4](导言)}。毋庸置疑,新媒体不仅仅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正在颠覆和改造旧有文化,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世界文化,而创造的新文化会将人类带向何处尚未可知。在这个事关人类未来走向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不能任由技术来支配,而是要通过设计技术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由新技术塑造的文化新时代,人类迄今为止的优秀文化传统不应该被抛弃,而是应该依托互联网平台,在数字化转型后有机地嵌入到新的世界文化之中,应该避免各种权力体的宰制和操控,始终承继互联网反控制、去中心的基因,努力坚守思想自由、民主协商、公平正义的不变追求,生发出“数字化人文主义”,整体地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

四、文化模式的和而不同:从封闭拒斥到创新改造变化中的新文化景观

依靠新技术发展起来的现代传播活动使时间和空间日益分离乃至虚化,先前由它所规定的关系和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世界也由“此时此地”的概念被“地球村”、“全球化”的定义所取代,能够被世界所共同接受的国际文化隐然成形。国际文化涉及在场和不在场的相互交织,涉及‘远处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地的语境的交错。国际文化这种超越时空和地域生活方式限制的社会关系并非区域文化的简单集合,这其中也包括了权力关系,对于它,有些国家掌握的更多些,能领导潮流、发起运动;有些国家则处在被动接受的一端,甚至还受它制约。

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物质和制度保障外,一套开放而又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系统也是十分必要

的,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靠的就是这样一套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套系统在维护自身核心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纳外部的新观念、新意识,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时代性,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在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这套价值系统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从一开始借助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强行灌输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敞开国门的自愿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大举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华文化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在国际文化中标明自己的文化身份。特别是强调个性、平等和参与的新文化为传统文化找寻自己的方位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明显被打上西式烙印的日益同质的国际文化中,借助中国的互联网优势凸显中华文化的特色,利用全球文化贸易平台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实力,增强传统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话语权,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要充分利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他们在一些领域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回避拒斥、闭关锁国、自以为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正确面对、积极参与、有效利用才有可能摆脱困境。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也许能给我们以启迪,“文化—民族主义”不是采取排斥和否定的逻辑,而是战略性地吸收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使之成为本土的东西。其实,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有许多东西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特性,表现为一种常识性和规律性存在,正是这些人类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素质让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新文化中包含了这样的素质,我们要对这些因素加以鉴别和吸收,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将自身融入到国际社会,即对待国际文化要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

当代中国正处在剧烈变迁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又要避免西方业已存在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追名逐利、个人主义、崇尚权威、工具理性的现代文化弊病,这是一个既学习又抵制、既继承又超越的过程。而新文化对于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至关重要。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以新文化对冲现代文化弊病的时候,对草根、反叛、解构、颠覆的强调一定要和这种文化的社会批判意识相结合,否则就可能走向虚无主义。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要破除一个旧世界,又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参考文献

- [1] 顾学文. 儒家文化如何治愈“现代病”:独家对话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N]. 解放日报,2015-11-06(13).
- [2] 成中英. 论中西哲学精神[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
- [3] [英]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4] [加]德克霍夫. 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刘传红)